

夏玉润 著

朱元璋與鳳陽

朱
明
題



黄山书社

朱元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鳳陽

夏玉潤 著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元璋与凤阳/夏玉润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03. 12

ISBN 7-80630-944-6

I. 朱... II. 夏... III. 朱元璋(1328~1398)—
人物研究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124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 经销

合肥长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 插页:6 字数:630 千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52.00 元

序

把一位开国皇帝与他出生地的地方史扭成麻花，在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角度加以研究，本书不仅完成了体裁的艰辛创格，而且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具有原创性，又有如此宏大的规模，可谓起迈前哲。这一起迈，是从前哲的肩头起步的。作者视野、史料的蒐集运用，时代赐予的说话自由度，非前修所能梦想。对开山者如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仍保持后学的崇敬。没有春之泥泞，何来秋硕果？学术史总是在继承中发展。

本书紧抓“贫穷造就了一位开国皇帝，而开国皇帝赐予家乡的恩惠又还原成贫穷”这一主题，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淮河文化、凤阳文化的形成、发展、特征以及当代遗存，对明中都、皇陵等建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礼仪典章制度等在中国都城史、中国陵寝史中的地位及作用，对明代凤阳区划的变迁、官吏的组成、驻凤军队的兴衰、专门关押犯了罪的朱元璋子孙们的高墙的始末，以及凤阳人口的构成及逃亡等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与探索。从而使本书的特点、色彩在我国众多区域文化史著作中别具一格，也使本书变成进入凤阳历史公园的一张旅游门票，更是凤阳后继主政者资治的一枚指南针。

朱元璋静卧明孝陵寝宫已达604年。在此期间，中国比从未跨入大学门、仅是业余研究者夏玉润先生的才识学问更高的专家太多了。他们没有机缘完成玉润的业绩，是没有做，而非不能做。玉

润得天独厚地做了凤阳人，熟悉乡土文献和民风民俗，有幸获得像王剑英先生等长辈们的启迪，他有心胸与毅力，找到了发挥平凡生命的袖珍舞台。成功的选择，意义并不小于学术上的建树，人的幸与不幸，文字说不出子丑寅卯，我又何言哉！

二

在人类历史上，朱元璋是个独特标本。他把明君——恩君——暴君三个似乎截然不同、而由此岸滑翔到彼岸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的角色，演得十分出色。

他身为乞丐、牧童、沙弥、士卒的时候，地位低贱，生活困苦，跟贫苦百姓的处境毫无二致。民间传说的创作者、传播者们的善良，使他的形象得以美化并为大众所喜爱。在精通史籍者凤毛麟角的年代，戏曲、民间故事、曲艺里的朱元璋，往往就是人们心目中历史的代理品。

他驱逐蒙族统治，符合汉民族愿望。野心与现实利益教会他团结将士，安抚父老，尊重知识分子。其多疑嗜杀的另外半张脸为微笑所遮掩。

随着政治、军事的胜利，农民战争除打倒皇帝当皇帝之外，当时还没有出现第二个样板可供借鉴。由义军领袖到地主阶级最高代表人物的转变，可谓无师自通，顺理成章，顷刻完工的轻巧活儿。人民久乱思治，对他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出于真诚。他在收拾蒙族昏君统治积重难返的腐朽，战争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上，有足够的气魄与精力。对民间疾苦知之甚深，有造福天下的美好动机。此时皇帝常见多发的职业病居于次要地位。

元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虽低下，接近市民生活，但元蒙统治者对汉文化并非十分熟悉，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放在文化专制上面，反

而使得元杂剧形成文化高峰，为后代无法逾越；此时的元代画家亦怀着国破家亡的哀痛，乞求大自然的爱抚。中国绘画线条由再现物象达到情绪化音乐化的高度，成就堪与元曲并称双璧。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永远值得炎黄子孙自豪。

朱元璋稳坐龙椅的同时，潜在的阴暗面获得恶性发展。他撤中书，罢丞相，施行特务政治，大小事一人独断，万马齐喑；诛杀功臣，无辜见疑，仅胡蓝两党杀人五万有余；大兴文学狱，实行残暴的文化专制，使生动活泼的元画元剧一落千丈，近百年未能恢复生机。朱元璋用在位的31年悠长岁华完成了自塑的暴君形象。中央集权制被推到顶峰。

因朱元璋将全部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而接替他的子孙们多是无能无知无耻“三无分子”，承担不起重权的压力，于是吏治不修、偏听偏信、太监干政的必然局面出现了。捐税多于牛毛，激发了农民的反抗，镇压起义军又增多了军费开支，百姓水深火热，生活在没有亮色的绝望之中。明末，轻易中了满洲贵族反间计，冤杀边防大将熊廷弼、袁崇焕，削弱了国防，为清兵入关创造了种种条件。追溯到最初的祸首，大多与朱元璋负面影响有关。

我在凤阳生活18年，乡情浓于酒。父老以出了开国皇帝而自豪，朱洪武的一切罪恶都被乡亲们淡化了、健忘了。我们不应当苛求。抗日战争爆发不足70年，“文革”浩劫过去不足30载，许多历史教训却被当代青年人忘却。继港台进来的诸多“戏说”而后，大陆小说电视不惜篇幅工本美化封建皇帝，如乾隆销毁和删改古书数万计，文字狱杀害大量知识分子等劣迹，媒体却讳莫如深；又如连每个细胞浸透了政治野心、骄奢淫逸的太平公主本为李隆基所杀，在媒体上却成了李隆基崇拜的对象，且人情味十足。中国历史上比这些角色有见识有品德有情操的人何止千万，却很少被媒体注目，难道受封建帝制的毒害不过瘾么？我自愧短视，对于此类作品，不禁惶惑！而玉润却没有走这条路，他以持平客观的态度对待朱皇

帝，不粉饰皇帝给国人制造的痛苦。历史证明，皇帝是个悲剧性的职业；连他出于乡谊对凤阳的优惠也大多转化为灾难。龙袍再宽阔也遮挡不住帝制洒下的凄风苦雨。

历史，必须尊重热爱；祖宗，又不可以选择。

朱元璋的严峻遗产告诉我们：帝制是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封建制度塑造了皇帝的性格，皇帝的性格又恶性地推进了封建制度的弊病。

二百多年前的曹雪芹批判贾母、王熙凤等人物，着眼点是制度，对其中某些人的才华美貌未尝不发出深沉的叹息。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攻击的是寄生于旧俄司法制度中的坏人。

今天，我们对待朱皇帝，应当比曹雪芹、托尔斯泰站得更高，哪怕我们的才华不及二翁的万分之一。

三

请朱元璋当导游，穿过时光隧道，感受了古城凤阳的变幻，崇楼杰阁，云谲波诡，光怪陆离。我的耳边出现了矛盾的对话，彼此争吵不休。

左耳声：开国皇帝总有几分自信。我独立于狂风暴雨中的皇陵之巅，看到在矮树丰碑的背景衬托下，神道两旁的石人石马，一个个都活了，在原野上狂奔长啸。雕刻石匠们的创造力虽逊于汉唐，但并不缺乏生命力的张扬，仍是天地间壮观。以此为起点视后来明清两朝陵墓石刻，艺术性则代代萎缩，气象格局每况愈下。凤阳的石匠们（也许是外来的）手艺高超，气韵恢宏！我想笑……

右耳声：该笑，人类总不能挥别希望而孤零零地苟活。我愿十三亿神州儿女个个开怀大笑，也允许有几个不笑的人在沉思，乃至在流泪，这叫差别万岁。

左耳声：你就流泪了，为什么？

右耳声：拿赵孟頫、黄子久、倪雲林、吳鎮、王蒙、方方壺的畫與鳳畫相比；將關漢卿、王實甫、白朴、馬致遠的雜劇與鳳陽花鼓小曲相比，則不倫不類。如首都類比於小鄉鎮，能不泫然么！何況數百年中鳳畫與花鼓也乏驚人之筆，逃不脫平庸沒落，可會與鳳陽花鼓戲一樣成為《廣陵散》呢？

左耳声：你太脆弱！偉大的東西都會消亡，這是辯證法的勝利。你如此執著，太迂了！應該細細看看夏玉潤先生的書，能破除你的偏見，把興亡付於規律和大歡喜之中！

右耳声：而今出版學術專著要花錢，困難重重，夏先生的書上哪兒去找？

左耳声：有好友吳庭美、林福江、黃學貴、陳懷仁等相助，業已出世，你就站在書的大門口。請進！

柯文輝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於北京

自序

孩童时代，母亲常给我讲述朱洪武的故事。当时的印象：朱洪武是个满脸大麻子、又丑又脏、又有本事的讨饭花子，后来当上了皇帝。

读书时，正逢建国之初。随着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建立，反右派、大跃进的开展，在这一政治环境下，我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已带有左的政治气息。此时的我，对在凤阳流传的有关朱元璋的传说，逐渐由半信半疑发展到不屑一顾。认为自己是新中国红旗下培养的学生，岂能相信这些充满封建内容的胡言乱语。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与青少年时期的我，逐渐产生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其中的一项内容便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这在极左路线统治一切的岁月里，明中都皇城、皇陵、龙兴寺以及有关朱元璋的一切文化遗存，遭到了毁灭性地破坏。当年我虽没有参加红卫兵毁坏文物的“革命行动”，却在一旁拍手叫好。后来，随着扒拆中都皇城城砖的全面铺开，我也曾为了换取几元钱买一双鞋的利益，加入了这一行列，并为响应“砸烂旧皇城，建设新凤阳”、“让朱元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口号而自豪。如今，每每回忆此事，当年的无知、愚昧、鄙陋使我嗟悔无及，乃至每踏上这座皇城遗址，一种忏悔负罪之感油然而生。

二

“文革”虽给中都皇城、皇陵遗址带来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但动乱岁月所造成的人口无序流动，却给家乡文化带来了暂短的生机。其表现为：

1969年，国家教育部及所属单位在凤阳县总铺、黄泥铺、殷涧三个人民公社设立“五七干校”。同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科技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在周圩公社设立“五七干校”。上述各单位、学校的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来这里劳动锻炼或接受审查。

1972年初，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南京气象学院，以及安徽各大专院校的本科毕业生40余名，分配到凤阳县工作。在此之前，尚有一批工科院校大学毕业生分配至凤阳。这是自建国以来50余年分配到凤阳工作人数最多、时间最集中、素质最高的一批大学生。

1969年前后，一批1966~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有上千名上海下放知青落户于凤阳县各乡村。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充实帝乡的人口，从全国各地迁徙数十万移民定居凤阳，彻底改变了凤阳人口的结构，从而形成了明清以来的新文化。六百年后，因“文革”而派生出的又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移民运动，虽人数较少、时间较短，多数移民少则二三年，多则十余年便离开这里，但是这场移民运动给凤阳这块土地所注入的新鲜文化，起码对当时的凤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在上述移居于凤阳县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其中最著名者有钱其琛同志，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中行先生成为我国文化教育界的一代博学鸿儒；王剑英先生以一部

《明中都》，震动当时全国文物考古界、建筑史学界、明史界，其学术质量堪称中国一流；陈梧桐先生则以一部50万言的《洪武皇帝大传》，成为目前明史界研究朱元璋的顶级级学者。

大学生们和下放知青们，更是直接成为推动凤阳县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力。尤其是这批大学生为以后的凤阳农村改革，推行大包干，建设新风阳付出了全部智慧，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他们后来大多成了各单位的负责人或业务骨干。其中，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的风阳人吴庭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山东人姜玉峰等，成了凤阳县的主要负责人。特别引人注目地是在这批大学生和上海下放知青云集的风阳中学、凤阳县文工团，这一阶段为凤阳县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学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风阳花鼓歌舞剧目。上述文化教育成就，至今不能超越。

我与上述大学生们是同龄人。我被大学拒之门外的原因，是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文革”初期，失学的我为了解决最低的生存需要，曾从事铺路、打石头、扒沙、拉车运货等谋生之业，后又下放农村、招工于水泥厂。在家庭政治、经济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我认准了音乐创作这门艺术，经过几番拼搏，终于调进了当时我梦寐以求的全县文化艺术中心——凤阳县文化馆。

我在文化馆的10年，是我人生开阔视野、积累知识的岁月。我一面从同事们身上吸吮着各类艺术的营养，一面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与移民中的精英们朝夕相伴。在与他们长时期的耳濡目染中，使我认识到，我足下的这块土地，蕴藏着华夏民族珍贵的文化艺术瑰宝：凤阳花鼓、花鼓灯、凤画。于是，我开始对花鼓艺人进行系统地采访、录音，创作了一批以凤阳花鼓、花鼓灯为题材与表演形式的大型歌舞剧、舞蹈、歌曲等。在此同时，我对朱元璋在凤阳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如明中都、皇陵，产生了与以前截然相反的认识。并从中隐约地感受到朱元璋与故乡凤阳有一种高深莫测的联系。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从对家乡文化产生的兴趣，逐渐将我引

入研究凤阳花鼓、研究朱元璋的学术活动之中。当我一头扎入这一学术领域的海洋中时，便被其中奇妙的魅力强烈地吸引住了。从此，从事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成了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三

就在这段移民文化渗入凤阳的暂短时期，我有幸、有心结识了两位终生影响我的恩师挚友：柯文辉与王剑英。正是这两位移民改变了我这个从生至今一直囿于小县城、才疏学浅、寡见少闻并自命不凡的小县民的命运。

柯文辉，安徽安庆人。从年轻时的满脸腮胡到今天的秃顶巨颧、虬髯连鬓、苍苍然一尺有余，其年龄与貌像并不相符，后者大于前者。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便称他为“老柯”，数十年来一直不改。其实他仅比我大十岁出头。仅小学文化的老柯，靠着父母赐予的特有天赋，加上他的勤学苦读，8岁便能写古诗。1958年，年仅20出头、在安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老柯被打成右派，于1962年下放安徽凤阳农校（今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喂猪18年，1979年离开凤阳，后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数十年来，著有专著10余部。其中，《史圣司马迁》长篇史诗小说，被誉为20世纪我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一代戏剧大师吴祖光誉他为“国宝”；原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称他为我国著名的戏剧作家、传记文学家、诗人、散文家、美术理论家。老柯18年流亡凤阳的艰苦岁月，使他每每提及，必口称凤阳为“第二故乡”。

1972年，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是在猪圈中。那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好日子，只见他为了抵御春寒，身着一套破旧的雨衣雨裤，脚登长筒雨靴，正在搅拌猪食。月薪仅30余元的老柯，要供养妻儿全家5口人，且3个孩子还要上学。妻子黄辉常背着他带着孩子去讨饭。记得有一天，两天粒米未进的老柯在深夜里砸开了我的门，两

大碗面条他一口气便吃个精光。贫寒的生活、相似的政治身分将我俩之间的情感牢牢地粘在一起，8年来几乎形影不离。老柯博及古今、学贯中西的渊深知识，看书速度极快、且过目不忘、数十年前看过的书刊仍历历在目的超人记忆力，口出话语多带有哲理，3分钟便能征服听者的口才，敏锐、深邃、非同常人的思维方式等，使我感到和他在一起谈话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学习方式。老柯的才气，在我以后交往的文人中，很难找出第二人与他相比。更难得的是，艰难困苦的环境，却造就了他宽厚、正直、仁慈、助人为乐的品质，并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重新看清真善美的标准。这段交往，对我以后作品（包括本书）的思路、格局、风格、特点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老柯离开凤阳后，我俩经常保持联系。他常告诫我：要开拓心胸，设法与中国文化界知名专家学者们保持交往与沟通，长年蹲在小县城，是写不出有分量的作品的。为了给第二家乡的文化事业增辉，他将我国著名教育家、文艺家王森然先生的遗稿《春妃秋郎阁集剧目》交给凤阳文联扩编。此项工作在姜玉峰、裘玉旺、陈怀仁、孙建密等人的组织下，由凤阳师范李绍宗老师和我任主编，抽调凤阳县数十名教师、大学毕业生参加编写，经过前后10年的努力，终于编成我国第一部长达350余万言的《中国剧目辞典》。老柯在辞典的资料搜集、体例制定、联系出版等做了大量工作，却坚决不愿在该辞典上留名，其高风亮节为同道们敬仰与称道。

四

影响我一生的另一位恩师王剑英先生，1921年出生于江苏太仓一个名门望族后裔的家庭。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后考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历史研究生班，从师于一代导师邓之诚、齐思和，主攻明史。1951年毕业后分配于教

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9年，王剑英踏上了凤阳这块充满朱元璋气息的神奇土地。当他看到这座时隔六百年、已被历史与现实忘却的中都遗址后，决心打开这座尘封的历史大门。王先生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特定艰苦环境下，自费在南京、上海、北京各大图书馆内查阅资料，在凤阳实地勘察遗址，走访群众，并在默默地忍受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呼之为“神经病”的绰号中，完成了一部震动当时文物考古界、建筑史学界、明史界的著作——《明中都城考》（该书稿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改名为《明中都》）。

1974年一个盛夏的夜晚，气温高达39度，气闷无风，我与文化馆的同事们被热浪驱往大院内，手持芭蕉扇纳凉谈心，无法入睡。而在文化馆内的一间小屋内却灯光透明，我进屋一看，眼前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屋内一无电扇、二无蚊香，仅穿一件裤头的王先生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赤脚插在水盆中，正坐在硕大的乒乓球桌旁撰写《明中都城考》书稿。为了防止汗水湿透稿纸，他在右手臂下垫了一块干毛巾，桌上、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他不时用左手拍打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古人所说“悬梁刺股”一语，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这一难忘的画面，永远刻入我的脑际，终生不忘。

1975年7月，王剑英先生《明中都城考》初稿完成。这是一部淡蓝色的封面、16开本、用几种不同字体的打字机打印而成的书稿。我有幸获得一本。当我打开这部散发着浓郁的油墨之香的书稿时，心中震撼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看的有关明代凤阳历史的专著。不仅书中引录的《明实录》、《大明会典》、《国榷》、《凤阳新书》等书名是我第一次知晓，而且书中论述的大量凤阳史实，也使我第一次了然真相。说实话，当时作为搞音乐创作的我，第一次阅读这部专业性较强的史书，看得似懂非懂，越不懂越想看，越看越觉得长知识。确切地说，我走向学术研究的第一位老师，便是王

先生和他的这本《明中都城考》。

为了寻求凤阳花鼓之谜，从我此便与王剑英先生结下了终生的师生友谊。王先生在凤阳的岁月中，我经常到他的住宿地——教育部五七干校总部（今凤阳党校），去抄录他床前大木箱中的各种资料，参加他给凤阳有关单位演讲明中都的每一次讲座；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内，他亲自开下一张书单，要我认真去读；在他的住地——北京承恩胡同二号院内，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做学问的精神与方法；他对我每一封来信所提出的问题与要求，都一一回信，并作了认真、仔细、全面地回答，且每封信必在3页以上，丝毫看不出这位中国一流学者对一位小县城初学者的半点敷衍；他对我的每一篇文章，就像语文老师给小学生批改作文那样，在上面写下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所有这些，使我这个从未跨入大学校门的历史业余爱好者，得到了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明史专家的认真教诲，为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为本书的撰写，打下了基础。

王先生的才学人品，影响了凤阳这块土地上的人们。1994年11月，在凤阳成立了朱元璋研究会，聘请王先生为顾问。朱元璋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了第六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和第一届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出版了《洪武御制全书》、《第六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洪武六百年祭》、《起源——凤阳大包干实录》等书籍。所有这些，正是王先生当年在凤阳撒下文化种子后的收获。

五

大包干对凤阳来说，不仅是一场社会经济的革命，生产所有制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回归。凤阳人每当赞美自己的家乡的同时，必把朱元璋、凤阳花鼓与大包干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认真思索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凤阳经济，必须打出朱

元璋、凤阳花鼓、明文化的品牌。于是，大力发展凤阳旅游产业，并将其作为凤阳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当地政府与群众的共识。这块土地第一次把发展社会经济与弘扬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经济文化背景下，我开始有目标、系统地对凤阳史料进行收集整理。

我的爱妻胡爱琴也是一位移民——上海下放知青，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每逢寒暑假，全家便返回上海岳母家度假。此时的上海图书馆，成了我的大学课堂。我把假日的全部时间，放在读书和查阅资料上。20余年来积累了大量有关凤阳的资料，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文化界、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了一个热门课题。在“交叉科学”的旗帜下，与文化“联姻”的学科纷纷涌现：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地理学等等。在这一学术研究大环境下，我受到了启示，由此为本书的撰写提出如下问题：朱元璋的牧童、沙弥、乞丐、士卒的人生最低贱出身，不论在中国帝王史中，还是世界领袖人物史中，都是十分罕见的。那么，朱元璋的特殊身世与家乡凤阳有何联系？凤阳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对朱元璋的经历、个性、气质产生哪些影响？反过来，朱元璋称帝后他的特殊经历与个性对凤阳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哪些作用？朱元璋为何要在凤阳建都？又为何罢建？明中都以兴废及皇陵的修建对凤阳产生哪些影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书在撰写中注意如下几点：

一、将朱元璋与家乡凤阳的关系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织，力求本书既是一本地方史专著，又是一本区域文化史专著。

二、采用冰糖葫芦的结构，把凤阳地区主要是明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用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串在一起，从而表达本书如下主题：贫穷造就了一位开国皇帝，而开国皇帝赐予家乡的恩惠又还原成贫穷。

三、朱元璋与凤阳的关联，突出表现在明中都城和皇陵两大皇家建筑群上。本书以王剑英先生《明中都》、《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为基础，在史料的挖掘、研究方法上力求有所突破。从而表达如下观点：这两大建筑群所表现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中国都城史、陵寝史中具有里程碑的重要作用。

最后，谨以本书虔诚地献给：

生长、居住、关注于凤阳，以及喝过淮河水的所有人们；

热爱、关心、建设、服务于家乡，并为此流下辛勤汗水的所有人们；

从事、参与、帮助、关爱过文化和历史，不论是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所有人们。